



边看边聊

1991年9月28日，秋高气爽，秋竹移窗，父亲陈从周身着那件母亲为他定做的灰色外套，戴上我为他买的墨镜，在表哥徐正平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向同济大学“文远楼”走去。那天的教室又是座无虚席，门无停宾，正培训着的上岗新教师静候着老夫子的到来；过硬的学术功底，等身的著作，半生的湖海奔走，父亲已无需作报告讲稿了，一杯绿茶，几根前门牌烟足以助他将“惜阴，惜物，惜情”说得透彻明了，耐人寻味。

面对着新上岗的青年教师，父亲说：“你们到了我这般年岁时，要问一声有没有浪费光阴，你们来同济是当学者，搞学问，所以检验的标准是搞了多少个建筑，写成了多少本著作。”他以“开卷有益”反躬自问，今天做了些什么？写了什么文章？画了什么画？如果完成得不好，就是虚度光阴。

对社会上的某些青年

惜阴惜物知惜情

陈馨

好挥霍、摆排场的虚荣，父亲劝大家要惜物。他说：“浪费得越多，破坏得越烈，将来老夭要和你算总账的。”

而师生情、朋友情、夫妻情、亲人情，处处是情，未了的柔情。父亲说老师的责任心也是情，我家那时终年宾朋如云，客来入往，更有远道而来的求教者，学生们有问题抬脚就坐在客厅里了，父亲接之温温，垂询频频，倾囊相授。

学园林须通曲词，他把昆曲引进了课堂，学戏曲去苏州园林感受“游园”“惊梦”，开门教学，于实境中领会园林艺术；他为“诸生讲园林中建筑问题，自觉有新意，上课不能写讲稿太死，往往随讲解中颇有灵机也（1986年11月26日日记）”。父亲授园林课，忽闻窗外莺啾，他离开讲台，步向窗

户，口吟：“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以唐人诗释园林春景之妩媚，文理相通，是他独特的教学。

他以自己的“薄有成就”告诫学生做学问，贵在像兰花叶子那样，要有股难折断的韧劲，百折不挠的毅力；他指导弟子们做论文，“宁小而全，忌大而空”，就像在小河里抓鱼，先筑堤，后抽水，一网打尽河塘鱼，做小河里的“权威”“专家”，在学术上才会有机会发声；他鼓励学生查资料，调查走访，现场动手，出一身汗，掉几斤肉，蔡达峰跟父亲在豫园学园林，“生怕不能达老师的意图，夙兴夜寐吃住工地”。

他招研究生别出心裁，考古文、国画，面试考生，问来自何处，家乡有哪些学者，写有哪些主要著作，有什么成就。1956年在一次扬州的规划实习课上，他问阮仪三：“你是扬州人吧？你是三字辈，你晓得你家人的字辈吗？阮元是你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阮仪三答：“大学问家。”“什么大学问？”一连串问号，使学生答不出，反问先生，父亲说：“自己的老祖宗不晓得，回去翻书，弄清楚再来问我。”

他请蒋启霆先生给研究生开古文课，繁体竖排，指定学生阅读的书目，从四书五经到明清笔记；习画作业是直线条画竹竿，曲线条画兰叶，画

圈五千个，圆葡萄、枇杷、葫芦的形状，一次交十几张作业，他说搞园林的不会画几笔国画不行。刘天华当年交卷图便是“枯木竹石图”，考察达峰用文言文写“中秋之夜”；父亲颇为得意既培养了园林古建筑人才，又培养了能写的文学生。1987年3月9日父亲记：“为硕士生阅读考卷，语文进步多矣，今后如能坚持几年，则中文系望尘莫及。”他说学生是半个儿子，他将《园林谈丛》送刘天华，题：“由来秀骨清，我生托子以为命，天华从余游，适是书新刊，采杜诗赠之，谊见于斯矣。”

父亲二十多年来为师生友作序写跋近百篇，但为弟子写序又是别有一番亲切之感。父亲六十年代初在扬州研究古迹园林时，屡客其地，总要去看看清朝名儒阮芸台故居，恰其裔孙阮仪三随父亲学建筑规划设计实习于扬州，从此师生关系亲密了。后阮仪三陆续写了《古城遗迹》《旧城新录》《江南水乡城镇》《古城寻趣——平遥》，求序于师，父亲复庆其成写：“阮生仪三，先德芸台先生，著作等身，为清乾隆时著名学者……，仪三承家学，目濡耳染，有异于流辈，莞尔能察余意，遂奋力为是书，正如阮元先生在西湖筑了阮公墩，留千古湖上佳话……”

“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有些凉意了，近日又重读了父亲论“师道师责”的文章，此文以一代园林宗师之教诲写在教师节时，该是父亲期望看到的吧。

敦煌、黄河、军马场……八月，习近平总书记的甘肃之行，不仅沸腾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新丝绸之路，也让远在上海的我刹那激活记忆闸门。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下旬，我怀着对“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憧憬，来到黄河边的兰州大学中文系。那年我只有十五岁，仿佛天上而来的黄河之水是清澈的、凉凉的。在岸边亲水、和煦的晚风吹来瓜果的清香；浅水滩里的鹅卵石上纹路清晰生动，似乎是远古时代的什么符号要求我和对话；还有一条条几乎透明的柳条鱼群涌群撒，不撒点面包或馒头也没关系，一会儿又照样热情地望着水边的我。直到七年之后我获得硕士学位离开之际，黄河之水仍是清澈的。

在黄河之滨，我通读了庄子、老子和金戈铁马的吟唱。而唐诗、宋词告诉我的是：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是汉民族尚武刚烈风范的园囿，是家国情怀的初心，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故乡。随着本科在黄河边一晃而过，我对神秘的敦煌自然更加心驰神往。她心灵上离我很近，但实际上空间上离兰州又很远。毕竟两地之间相距一千一百公里，今年七月刚通的高铁也需运行八个小时。

对于不会骑马而只有自行车的我，去瞻仰敦煌石窟几乎等同于《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吧。那时，也没有稳定的各类公共交通班次。好在我很快成为了胡培教授硕士研究生，他从北大毕业后就一直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对敦煌也是十分景仰；又好在，国家层面从开发西北、助力甘肃发展的高度把敦煌列入历史文化名城，绿皮车也开始有了每周固定的班次。终于在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兰大中文系在敦煌举办一个文艺学的全国研讨会；我则以会务组成员身份参与。一九八六年的开学季，我和导师及师门同学一起去莫高窟、鸣沙山

等中华文化圣地发思古之幽情。而这敦煌的葡萄，果然是特别地甜！

除了胜过吐鲁番的葡萄，至今难忘的还是敦煌壁画，特别是飞天！当然壁画里的建筑、服饰、城池、农耕、纺织、市井、宴乐、舞蹈、狩猎、商贸、军事等场景华丽，栩栩如生！其笔触的恢弘与写实，感觉比我的老家大同风格雄奇的云冈石窟更加精致、丰富、细腻。至今，这些难忘的情景还是我任教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课堂素材。记得回程坐在从敦煌到兰州的火车上，夜间感受着初秋窗外大漠里浓重的荒凉，让我不由自主想起金庸小说里的大漠故事。

列车上的年轻人难觅，我们自然议论和导师一样，从北大毕业就来甘肃献身大漠的敦煌守护者。这是一个群体，其中还有一个在我们眼里娇弱的上海女人——如今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敦煌学权威樊锦诗教授（沪剧《敦煌女儿》原型）。这上海女人，是如何坚守在荒漠孤野的？难道她会不明白和“葡萄美酒夜光杯”同时代的境遇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吗？而我在拜谒莫高窟、鸣沙山时就迅速明白了什么是孤独！这让我思考到上海、到复旦、到中年，直至今年沪剧《敦煌女儿》的公演。原来根本就没有葡萄美酒的浪漫，而樊锦诗教授心中的夜光杯就是忠贞的情怀，就是“敦煌不仅是夜光杯的故乡，更是敦煌学的故乡！而世界级最高水准的敦煌学平台就在她的故乡”！

我以为，如今我们眼里焕发青春、甚至数字化的敦煌莫高窟，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血脉畅通、呼吸停匀，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窗口！这也是上海女儿的情怀！

在夜光杯的故乡

要英

至今的悬念

周珂珺

说起我与新民晚报的渊源，还得追溯到1972年。那年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我跟随母亲去湖北省随县探望在部队工作的父亲，曾在当地的一所农村小学借读了一学期。记忆中那是一所建在山坡上

找张老师问起那张新民晚报。张老师说这张报纸是她向村里的一个上海知青借阅的，已经还给人家了。我问起日期，她也被问住了，说日期倒是没留意，若遇到那位知青她可以再问问。一连几天，张老师都没给我回话，有一次我故意迎面向她走来，她大约感觉到我期待的目光，便说下次遇到那位上海知青一定会问了告知我。但之后张老师没再提起过，我亦不好意思追问了。

一天，下课时分，我路过教师办公室，被五年级的班主任张老师叫住：“周珂珺你看看，这是你们上海的报纸，新民晚报。”她向我递来了一张报纸。我有些惊讶地接过报纸，便靠在走廊的柱子上专心看了起来。报上都是一篇一篇的小文章，我读着其中的一篇，虽然字还认不全，但连着上下文大致尚能读懂，正读得津津有味时，上课摇铃了，张老师来要回了报纸，并催促我回教室上课。

接下来的听课便没了心思。我在想，我从上海到这儿先要乘上三天的轮船，再坐五六小时的火车到县城，然后还要坐两小时部队派来的卡车。那么遥远偏僻的地方，而上海的一张报纸居然可以传到这里，能够在上面写文章的人太了不起了，我以后也要在报纸上写文章……

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把看到新民晚报的事告诉了父母。不料父母异口同声说，现在哪儿的新民晚报？是不是看错了？我肯定地点点头，说没错，新民晚报这几个字我还是认得的。父亲又问：“你看日期了么？什么时候的报纸？”这一问，我被问住了。翌日，揣着疑问，我

将返沪。临行前几天，我们家属院的双胞胎兄弟大华小华要去看望他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我要跟着去，因为我还惦记着那张报纸，甚至还想见一面那位上海老乡。小哥俩勉强带上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过了。不巧的是张老师赶集去了，等了个把小时，眼见日头西落，张老师仍未归。大华小华只得留下送给张老师的礼物一袋糯米，与她父母作别。我有些失望，走在田埂上回望这个村落，此时，晚霞开始漂染天空，不少农舍已升起了袅袅炊烟。

于是乎，这张晚报的日期终成了一个悬念。当然，时至今日，这个日期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年还是孩子的我，在异地意外读到这张来自家乡的报纸，那份惊喜和激动，乃至产生的萌动，仿佛冥冥之中牵引着我，使我在成年之后成为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并努力成为了副刊作者之一。

棋风

天元宝室



我开了个围棋班，经常有学生家长来咨询一些奇怪的问题。就说昨晚吧，我正和朋友吃烧烤，有个家长在微信里问：“老师，请问我们家孩子是什么棋风？”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孩子刚来上过一次试听课，我连名字和脸都对不上。

无论在棋盘上，还是生活中，随机应变都是老师的基本素养，我很认真地回复：“孩子的围棋还在成长期，没有形成固定的风格，随着棋力的提升，比赛经验的丰富，未来可期。”

雨中的上海，有点小清新，行人车流藏了起来，马路显得宽阔整洁，答案被风吹得无力无味。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开始接触围棋的，当时中国正处在赶超日本的阶段，每一位日本超一流棋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宇宙流武官，地铁流小林，美学的大竹，天煞星加藤，叩桥不渡林海峰，劝君取地赵治勋，每次说起他们的对局，都是激情澎湃。等我长大后，懂棋了，再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棋，拆二，小飞，平淡，朴素。

说好的华丽呢？是我的记忆跑偏了吗？不，是文字工作者的伟力。介绍棋手，个人履历上的姓名、段位、战绩是不够的，要添上对棋风的探讨，人物才瞬间饱满起来。每当你听到石佛李昌镐、妖刀马晓春、铁门聂卫平，想这位选手大概有故事，文字工作者便出现了，娓娓道来，把一滴水写成汪洋大海。

好像我站在这里，有人说凭窗倚立，满楼红袖，也有人说对花落泪，望月伤心。其实我就是等在等个串。文人笔下的棋风，终究是个伪命题。

从专业的角度看，没有这么多花团锦簇的流派，棋风分两大类：一类崇尚力量，一类热爱和平，用围棋术语叫战斗型和均衡型。前者依托计算，后者倚重判断，两种风格本身没有高下之分，不过在围棋少儿教室里，老师会偏爱战斗型学员。一方面，战斗的棋更有观赏性；另一方面，勇于探险才是少年天性。小小年纪，就在候选世界和平大使，画面太美不敢想。

棋风是怎么形成的呢？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小孩也不例外。有些学员计算不行，做死活，好像相亲那样相半天也相不明白，下棋会刻意回避复杂局面；有些学员计算不差，家长拔苗助长，安排了很多指导棋，因为实力差距太大，越用力，输越快。这样的棋下多了，孩子不惟以最大恶意揣度自己的计算力，久而久之，形成了龟壳流。

棋逢对手才是人生幸事，假如对手太强，对局前就知道了结果，孩子学围棋的兴致也会减弱。与其思考棋风这些虚无的课题，家长不如安排孩子多做题，多下棋，和同水平段的孩子一起下棋，本身就是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我的串烤好了，接在手上，满满当当。又有家长发微信提问：“老师，孩子的棋形不正，该怎么纠正？”我看了看手上的大腰子，沉吟了两秒：“以形补形”



暑假伊始，从承德避暑山庄乘车四小时，到了塞罕坝草原，这是清代皇家猎苑之木兰围场的一部分。草原上有湖泊河流、森林山丘，有清代的历史遗迹和浓郁的满蒙风情，成群的牛羊、成片的小花点缀在绿茵中，清新的凉风吹得人忘乎所以。

坝上的白桦林更是耐人寻味。白桦伟岸挺拔、耐寒喜光，生命力顽强，既有冲破天地的傲然气质，又不失率真朴质的温和个性，它那文艺范儿，令古今中外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们一往情深。

吴冠中描绘白桦的作品形式多样，我过目的也不在少数。他为寻觅白桦林，竟从吉林长白山追到新疆阿尔泰，他说：白桦，雪白、银白，间有墨黑的

斑纹，像浓墨泼落在素白的宣纸上，极美。苏联经典歌曲《白桦林》，描述二战时期一个士兵凄美的爱情故事，忧伤的旋律荡气回肠，有多少人曾为之心灵颤动。

白桦树与生俱来的独特美感，从来就是摄影镜头孜孜不倦的追随对象，那些在不同季节拍摄白桦的佳作，拍得光影斑斓、如歌如画，令人神往。

导游说，塞罕坝草原的深秋景致，最妩媚最动人，夏季的青绿色调将会变成黄红的暖色世界，那些白桦的叶片，赤金一样地挂在岁月的枝头，树干也更加挺拔秀气，更加洁白斑驳，这一时节实属旅游赏景、艺术创作的最佳时机。导游说得极感性，也极有磁力。

七夕会

摄影



夜光杯